

變動中的東德共黨政權

吳東野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今年（一九八九）夏天，歐洲發生了戰後四十餘年來鮮見的變化。戈巴契夫的改革與開放政策，帶動了波蘭與匈牙利史無前例的體制革命，不斷湧往西方的東德難民潮與各地掀起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逼使執政長達十八年之久的何內克（Erich Honecker）政權垮臺，進一步也促成東德內政作巨幅的轉變。東歐集團內部的改革呼聲所呈現的是人民對共黨政權的忍耐已趨於極限，未來整個歐派的局勢發展，可能因此而重新定位。

壹、引言

今年十月七日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DDR/GDR；以下簡稱東德）成立四十周年的國慶日。從西方媒體的報導中，似乎看不出東德人民展露歡欣鼓舞的心情，各大城市所傳來的警察鎮壓反政府示威人羣的訊息，與近幾個月來東德人民大量逃往西德的難民潮事件相互呼應，其所印證的一項事實是：刻意規避東歐集團改革浪潮的社會主義統一黨（SED；以下簡稱社統黨）已陷入戰後專制獨裁統治四十載以來最嚴重的內政危機。人民的怨聲載道，經由「雙腳向外逃亡」與「雙手對內抗爭」兩條管道，來訴求其對共黨政治經濟改革的強烈願望。種種跡象看來，社統黨政權今後再也難用社會主義的幻景去矇騙已從睡夢中驚醒的東德人民。

東德人民所演出的這一幕「出埃及記」（Exodus），非且刻劃出其對維護基本人權與追求自由的天性，同時也再度凸顯了歐洲地理中樞因為德國問題之存在，而埋藏著不安的種子。政治學者在觀察戰後歐陸這段歷史之演變時，通常會把兩個德國間的正常化互動關係，列為整個歐洲安定與和平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現階段歐洲的政治經濟情勢，已近乎發展到唇齒相依的地步。一旦華沙集團中任何一員的內部發生重大變故，東歐其他國家必定會受到相當程度的波及，而西歐的安定也會受到影響。如果我們樂觀地依據戈巴契夫「歐洲共同家園」（The Common European Haus）的構思去預卜未來，即很

難再以國際政治學中的定義，蓄意把歐洲劃分成東、西兩大部份。匈牙利和波蘭能揚棄共黨的歷史包袱，東德共黨也難以抵擋日漸升高的民意改革壓力，重新改組內閣並更換政治局中的頑強派元老，這種種的突變已非用「共產主義社會徹底破產」一句話即可會意，問題在於共黨政權應該如何去因應其未來。匈牙利作家艾諾希（Istvan Eörsi）在談到東歐人民與社會主義的關係時，就很貼切的將之形容為：假設有人說社會主義是一匹駿馬，可惜牠已經死亡；那麼我們所感到興趣的不是牠的美貌外型，而是誰能取代牠去拉動車子，其餘的一切都是次要問題。……在西方，人們總是想去劃分社會主義的優劣；但是在東歐人民的眼中，祇要感受到史大林體系的一絲氣息，那麼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都絕難再得到人心。①這種比喻正是當前東德人民心聲的寫照。本文的宗旨就是想以東德最近的情勢演變作為楔子，從中去釐清共黨政權與人民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剖析出一向自詡其國民享有東歐集團最高所得的社統黨當權者心態，並以當前東德的若干改革新氣象，探究未來東德的可能發展取向。

貳、政權危機的形成

自社統黨成立以來，東德即無時不在內部領導階層間的矛盾與政治路線的搖擺不定中渡過。四十年來人民與政權之間的關係，構成了當權者無法兌現改革承諾，而人民永遠祇能生活在烏托邦夢幻中的一齣近代史悲劇。於今看來，東德社統黨前總書記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t）在一九六七年社統黨「七大」所揭櫫的「社會主義人民共同體」（Sozialistische Menschengemeinschaften）構思，②就是共黨夢境的最好詮釋。東德社會上層與下層間的意識差距，不是一天形成的，不久前社統黨剛下臺的總書記何內克親信弗格爾（Wolfgang Vogel）以不作任何「秋後算賬」之保證，遊說東德難民回到家鄉辦理合法出境手續，却根本無法產生效果；新任領導人克倫茲上任後所作的一連串的革新保證，也未能挽回大局，看來東德人民歷經無數的失望後，才是造成今日對社統黨絕望的結果。沒有人再想去嘗試被愚弄的滋味，當然也就更不會去相信

註① Günter Hoffmann, "Zwiespaltiges Reden von der Einheit-soll das alles wieder ein Provisorium sein?", in *Die Zeit*, No. 40/1989, p. 4.

註② 「社會主義人民共同體」概念是希望重建社會主義國家間新的社會人際和諧關係。但是從東德的社會主義發展程度來看，學理上顯然不够精確。因為烏布里希忽略了東德還存有階級區分，高佔了階級（Klasse）與階層（Schicht）的對立關係，同時也誤導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角色。 *Geschichte der Sozialistischen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Abriß*, (Ost Berlin: Dietz Verlag), 1978, p. 577f; *DDR Handbuch*, (Köln: Verla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Band II., 1985, p. 1177.

當權者的另一番美言。

一、烏布里希時代的史大林教條模式（一九四五—一九七一）

一九四六年四月，烏布里希與其同僚在蘇聯介入與假民主外衣的情勢下，聯合共黨與早期德國的社會民主黨（SPD）成員，在東佔領區成立社統黨傀儡政權。當時在一片「復興德意志勞工運動」的口號聲中，被迫分離的德國人民似乎對重新統合各個佔領區，充滿了希望。可惜好景不長，從一九五〇年七月社統黨「三大」召開之後，其內部的社民黨勢力即逐漸被清除，僅僅在十個月內就有十五萬名黨員遭到整肅，其中絕大部份係屬反烏布里希路線的原社民黨成員。^③諷刺的是，自詡代表勞工階層的社統黨，却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今被西德訂定為國慶日）遭逢建國以來第一次的工人大暴動。當時全國二七二個地方所發生的示威遊行活動，^④除了在規模上無法與今日相比較外，基本的訴求都是著重在政治改革。兩次反共抗暴事件唯獨結果不同的是，烏布里希曾下令動用軍事鎮壓手段。依據當時東德官方公佈的統計數據，共有廿五個人死亡與三七八人受傷；但是如果將運送至西柏林各大醫院的無數傷患及事後被判死刑或有期徒刑的示威者也併入計算，西方觀察家相信實際上的傷亡數字應不止於此。工人暴動的結果，固然帶動了社統黨政策上的修正，基本的政治路線却仍然不出史大林模式的範疇。如今，我們拿何內克在今年東德國慶文告中針對改革問題的一段辯詞：「每一個政黨都要承擔以及勝任人民所托付的職責，……絕不會把蘇聯的體制移入」，^⑤來比照戰後德國共黨理論家艾克曼（Anton Ackermann）在其「德國通往社會主義特殊道路」的理論中堅持不應翻版蘇聯模式的主張，社統黨根本就是在為其四十年的過失脫罪，這也是為什麼艾克曼本人最後仍免不了背負一個反黨罪名而遭到整肅的原因，一直拖到史大林死後才恢復名譽。^⑥之後烏布里希在批判史大林運動中，還曾大言不慚地對美國記者薛爾（Daniel Schorr）表示：東德沒有史大林主義，那裏會有反史大林化運動。^⑦與全球其他共黨一樣，東德社統黨也免不了追求個人崇拜，何內克於一九五一年八月國際共黨青年大會上，就再三諂媚

註③ “DDR Handbuch”, Band II, *op. cit.*, p. 1161ff.

註④ 根據社統黨的統計，約有卅萬人參加罷工或示威活動，比西方估計的卅七萬餘人，數字上顯然偏低。Dietrich Staritz, *Geschichte der DDR 1949-1985*,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85, p. 85.

註⑤ Joachim Nawrocki, “Noch eine Krise oder schon Agonie?“, in *Die Zeit*, No. 41/1989, p. 10.

註⑥ Christoph Kleßmann, *Zwei Staaten, eine Nation*,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8, p. 304; DDR Handbuch, Band II, *op. cit.*, pp. 1166f, 1570.

註⑦ Christoph Kleßmann, *op. cit.*, p. 304; Joachim Nawrocki, *op. cit.*, p. 10.

地讚揚史大林爲「全球和平的領袖與舵手」或稱其爲「各國青年的導師」；^⑧甚至在史大林死後，社統黨還以「新型態政黨」(Party of new typ)的姿態試圖用幹部政黨(Cadre party)爲過渡，期望改造東德共黨的體質，但是仍然沒有忘記尊奉蘇共爲老大哥。

現階段的東德新領導階層，面對東歐鄰國高漲的改革浪潮，雖幾經掙扎也難抵客觀環境變遷所促成的民意壓力，逐漸投入改革的陣營。過去東德領導羣堅持舊有教條而懼怕改革，實有其歷史之典故。當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赫魯雪夫(Khrushchev)改採修正路線時，東德領導人即未顯現改革之意願。社統黨內儘管勉強決定以「新路線」(Neuer Kurs/new route)改革計畫作些姿態，^⑨却也不過是針對過去操之過急的重工業發展或社會集體化等措施略加修正，對工人階級普遍所不滿的物價高漲及提高生產定額等問題，並沒有對症下藥。與一連串施政錯誤有直接關連的六月十七日工人大暴動事件，固然一度逼使社統黨承諾供給人民充裕的民生消費品，但是不久後又拿黨內意見分歧作藉口，終止執行「新路線」的計畫。擅長對人民開空頭支票的社統黨政權，當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首度面臨大量的難民逃亡潮時，^⑩烏布里希立刻於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五大」上宣稱：當西德人民的各項民生消費品水平已名列世界前茅之時，我們的重要民生工業產品預計到一九六一年或一九六二年時也能達到西德的水準，屆時某些項目甚至可以超越之。^⑪這一張可以比美中共「大躍進」政策的支票，給人民兌現的却是投資的錯誤與經濟發展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原料缺乏所導致各大企業間歇性的停工，使原本就供應不足的民生消費品，顯得更缺乏；已進行中的多項建設工程被迫停頓，成爲「投資廢墟」(Investruine)。七年經建計畫失敗的結果是，逃亡人潮的激增。手足無措的社統黨領導階層除了求助於蘇共外，也祇能以圍牆來斷絕人民對西方世界的嚮往。

二、何內克時代的個人崇拜（一九七一～一九八九）

多年來東德人民在評價烏布里希的政績時，少有人不將其視爲蘇聯的傀儡機器。一九七〇年代初，頑固的烏布里希竟也會違反蘇聯的策略，堅決反對簽署柏林四強協定，終而導致其政治生命之結束。今日何內克政權的壽終正寢，無異爲烏布里希下場的翻版。較大的區別是，蘇聯對何內克的接班人選，並未刻意去安排。綜觀當前社統黨新領導班子的處境，克倫茲能

註⑧ Joachim Nawrocki, *op. cit.*, p. 10.

註⑨ 「新路線」爲社統黨成立以來黨內第一次爲改革而辯論之產物。"Der neue Kurs und die Aufgaben der Partei (Beschluss der 115. ZK-Tagung von 26. 7. 1953), in *Dokument der SED*, Band 4, p. 449ff., p. 463.

註⑩ 幾年內，東德逃往西德的難民人數即達廿五萬。

註⑪ Joachim Nawrocki, *op. cit.*, p. 10; DDR Handbuch, Band II., *op. cit.*, p. 1170.

否安然渡過這一次危機，關鍵還是在於改革的速度與幅度，以及改革的過程能堅持多久。何內克當權之初的世界觀不也作出極端開明的假象，他除了強調開放性的文化政策外，也注意改善工人階層與子女衆多家庭的生活條件，並提高退休人員的養老金額；同時爲了因應東西兩大陣營的政治緩和趨勢，而與西德簽定「基礎關係條約」，非但拓展了東德的外交領域，也在東德的國籍問題、社會主義國家與德意志民族三方面之間找出定位。早期的這些施政作風，在東德人民心中確實一度享有相當崇高的聲譽，他在一九七一年六月社統黨「八大」所揭示的一番雄心壯志，想把東德建設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模範的理念，受到許多民衆之稱道，「艾瑞希」(Erich 何內克之學名)的政績不時傳頌於人羣中。但是從今天東德社會經濟的現況看來，何內克口中再三標榜的「社會主義是唯一把人看作人的制度，它不會浪費人的工作潛能，有助於增進人民的福利」，物換星移的今天恐怕連克倫茲本人也不敢再朗朗上口作爲說辭。與烏布里希執政末期的處境一樣，於今社統黨的信用已經降到十八年來最低點。政治局中的老人派(gerontocracy)恐怕仍難以瞭解，爲什麼今天的共產黨會普遍受到人民的厭惡，更難以想像的是昔日痛恨蘇聯模式的絕大部份東德民衆，竟會欽羨戈巴契夫的改革決心。匈牙利和波蘭這兩個兄弟之邦的大力改革措施，等於敲響了東德「社會主義人民共同體」的喪鐘，不少逃到自由世界的東德難民把西德視爲「祖國」(fatherland)，却將自己的家鄉稱呼爲「地區」(zone)。種種的現象，正符合了東德社統黨理論家兼社會科學學院主任藍鶴(Otto Reinhold)的一句話：東德人民已發生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的危機。^②

社統黨一九七五年「六大」所制定的政綱遲遲未能實現，顯然是加速東德政權危機的主因。何內克在進一步宣揚提昇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水平口號的同時，經濟政策却時現弊端，使國家的建設倒退若干年，特別是能源政策的失誤、重工業過度性的發展、手工業的社會化、激進的農業政策、農產品與畜牧業的分離作業、工業結構的不均衡調整、專賣聯合企業制度的建立，以及長時間忽視交通網建設的重要性等等，終使大局難以收拾。依照藍鶴的看法，未來幾年東德想解決各項內政問題的根本辦法，還在於生產力的提昇。^③事實上，藍鶴的理論應該倒過來印證，換句話說就是社統黨若不主動提出內政上的諸多問題，經由全民討論訂定解決之方案，人民永遠不可能會對領導階層產生信任感；如果新的接班羣不具備自我批評的雅量與政治經濟改革的勇氣，東德的生產力就根本無法提昇至令人滿意的程度。

三、理想與現實脫節的領導中心

註② Joachim Nawrocki, *op. cit.*, p. 10.
註③ *Ibid.*

東德建國後的四十年當中，總共約有三五〇萬人背棄家園移居西德，尤其近兩個月來的情勢演變，證明了社統黨過去僅止於口頭上的安撫與承諾已無法再挽回人心。東德民衆流傳諷刺領導層昏庸腐敗的一句話：「同志爬得愈高，民主共和國在其脚下愈顯得美麗」，^④十足呈現社統黨當權幹部的心態，他們的心中祇想到領導階層的利益，相形之下助長了個人崇拜之風，對人民最起碼的基本生活需求與人權保障則視而不見。混淆虛假與現實的自欺欺人作法舉目可見，就是從社統黨社會福利政策中最誇耀的國民居住問題與醫療制度，都可以找到案例來說明。一九七一年迄今，社統黨自詡在爲人民住的問題投資了三千五百億（東德）馬克，共計新建或修繕完成總數約三百餘萬戶的國民住宅。爲此何內克在今年國慶大會上，對東德社會主義制度下「住者有其屋」的政策還感到驕傲，社統黨的機關報新德意志（*Neues Deutschland*）更是馬不停蹄地大肆渲染西德的房荒與房價之高漲，暗諷難民生活上的困境。^⑤然而，事實的眞象是：東德自建國以來，人人有其屋的理想從來沒有實現過，離異的夫婦因爲分配不到住屋，而被迫繼續同居；年輕的夫婦住在沒有暖氣設備的閣樓中，使嬰兒受凍的案例屢見不鮮。社統黨的宣傳機器會一再保證，「視爲社會問題的住宅分配」政策最遲到一九九一年將可徹底執行。結果爲了實踐對人民的承諾，社統黨以加高既有建築物的層數，來滿足人民需要，導致熱水管破裂、電梯停頓、或長時間等待建築工人修復等問題不斷發生，民衆怨聲載道。更荒謬的是，社統黨爲了鼓勵人民遷入「新居」，特別於去年國慶日在東柏林爲第三百萬戶新居家庭造勢宣傳，黨政要員免費提供的電器產品和家具，把新居布置成「幸福的屋頂工人家庭」（*Glückliche Dachdeckerfamilie*）模範，然而待宣傳過後，新居立刻又回復至原狀。

另一項作爲東德社會主義理想中宣傳的全民醫療保險制度，這向來也是社統黨最引以爲傲的措施。何內克的四十年國慶文告中就直截了當地指出，東德藥品供給的對象不分窮人或富人，全民的健康維護應由社會共同負擔。^⑥但是實際的生活中，東德的醫院不僅區分爲專供領導階層、安全機構人員、與一般民衆的三級制劃分，黨員所享受的醫療器材和藥品，却多半來自西方國家的進口；一般人民非但使用的是老舊的醫療設備，必要的外科手術往往還得等上幾個月之久，以往有很多申請赴外探親或旅遊的東德人，其目的都是希望在西德就醫。^⑦

八十五歲的東德經濟與社會學者庫辛斯基（*Jürgen Kucynski*）最近曾諷刺性的質問社統黨政權：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東德的經濟生產力不是持續增加嗎？生產成本不是年年下降嗎？那麼這些發展成果對人民的生活又作了那一方面實質的

註④ *Der Spiegel*, No. 40/1989, p. 28.

註⑤ *Der Spiegel*, No. 40/1989, p. 30.

註⑥ *Ibid.*, p. 31.

註⑦ *Jahresbericht 1986*, (Bon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innerdeutsche Beziehungen), 1987, p. 56.

提昇？^⑥一個能大量製造電腦的國家，而人民却買不到家電用品；一個慶賀自己能生產玻璃纖維電纜的社會，住在首都的居民却往往要等上十多年才有可能安裝一具私人電話，有何值得驕傲？人民固然過了幾十年的低物價生活，想穿一雙品質較佳的皮鞋，却要忍受三百（東德）馬克以上的價格，種種的問題到底出在那裏呢？

諸如此類的危機在東德不勝枚舉，而社統黨政權似乎又找不出適當的解決方案。領導階層逐漸與現實社會脫節的結果，民怨的沸騰自然昇華到頂點。一旦外在情勢有所異動，內部的反彈力量也就相對加大難以壓制住。來自萊比錫等大城市示威人羣中「戈比、戈比」（戈巴契夫的另一稱呼）的呼聲不斷，即可體會東德人民對改革迫切的心境。何內克近年來極權式的領導風格，使他早已忘掉一九七一年五月三日上臺時訓誡黨內同志「永不可畏懼去面對現實」^⑦的一番警語。

叁、新領導階層的困境

幾年前假如有人預測，今日的東歐會出現體制上的變革，恐怕會被譏為異想天開。然而，當今年夏天波蘭出現戰後第一位非共黨籍的總理，匈牙利更經由修憲過程，將堅持了數十年之久的國號變更，計畫朝向多元化的政治發展邁進時，觀察家所感到興趣的是，「匈波模式」會不會對東德產生連鎖反應？最近東德的內部瞬息萬變的情勢，使幾個月以前還令人不敢想像的事，在最近幾週內都相繼發生，隨著何內克的被迫引退、政治局中的一些元老級人物下臺、各大城市的領導人相繼與民衆展開直接對話、警察首長為攻擊示威人羣而公開道歉、工會首腦引咎辭職、社統黨幹部與反對團體成員對話、撤除人民厭惡的地方官吏職務、考慮准予組織獨立工會，包容媒體報導人民的改革風潮，新任總書記克倫茲宣佈放寬民衆出境的限制、甚至國務院（內閣）總辭後重新任命德雷斯敦（Dresden）黨部書記莫德洛（Hans Modrow）為總理等等，都是社統黨呈現改革誠意的第一步。這些姿態似乎並未恢復東德人民的信任，大批年輕人湧向西德的景象依然如故。情勢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東德邊界所建的圍牆與防逃設備是否還有其存在的必要？東德的新內閣能否重建人民的信心或是轉移民間的不滿情緒？許多人都認為，匈波改革模式對華沙集團國家必定會產生衝擊，影響的程度往往要視主客觀環境而定。從今日共黨陣營的變局來看，傾向改革的國家，其形成的背景幾乎都是因為經濟長期的困境所造成，特別是波蘭、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等外債數額高居世界銀行排行榜前茅的國家。^⑧但是就東德的處境而言，相對東歐各國呈現出較穩定的經濟情勢，也因此為領導階

⑥ "Die Geduld ist zu Ende", in *Der Spiegel*, No. 41/1989, p. 26.

⑦ *Der Spiegel*, No. 40/1989, p. 34.

⑧ Bernhard Blohm, "Gefährliche Zeiten", in *Die Zeit*, No. 41/1989, p. 41.

層中部份強硬派作爲抗拒改革的藉口。過去東德的經濟發展每年經由各種管道獲得西德數十億馬克的眷顧，^①經濟上不像蘇聯等東歐鄰邦那般艱難。在東德甚少見到如東歐其他國家普遍的通貨膨脹現象，外債情況也不若想像中的嚴重，社統黨所承受的改革壓力自然形成不了氣候。最近，親社統黨的柏林日報經濟版前主編雷迪克（Alexander Reddig）在接受電視臺訪問時即指出：東德的領導人自信其經濟實力還算強大，根本無需改革。……如果在東德也像蘇聯一樣，連食用鹽都需定額配給，何內克應該早就對外宣稱他會考慮改革。^②不過從近半年來歐洲政局的變動觀察，東德人民早已不把整頓經濟作爲改革訴求的唯一目標。難民逃亡潮事件，印證的是東德戰後一代對共黨的改革誠意已徹底絕望；萊比錫、波茲坦及東柏林等大城市動輒數十萬人的示威遊行，已非隨便調整幾項措施即能安撫東德民衆經年累月的怨氣。何內克的下臺與莫德洛的竄升就意味著，即使是頑固保守的社統黨中央強硬派元老，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問題在於，新的接班羣就能滿足人民政治改革的請求嗎？

以當前情勢發展看來，似乎較少樂觀的理由。研究歐洲政治的人必定會承認一項事實：即東德人民的改革風潮，直接受到來自同文同種的西德影響層面很大。西德的一切，常常成爲東德人民生活上的指標。到過東德南部工業區的人，大概都能體會出共黨社會主義暗淡的前景。以往，東德人民面對過社統黨無數的承諾，却一直不斷地在失望中期待新領導階層的覺悟。終於等到東歐發生歷史性之變革時，爆發了自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以來壓抑已久的另一股大規模反抗運動。

今日共黨獨裁政權的普遍弊病是，國家的命脈祇掌握在少數極權者的手中，而這些自豪建國有功的老年人，幾十年的權力獨享早已使其忘掉人民。一般而言，獨裁政權能走向改革，通常都是正處於一個新舊兩代交替之時，匈牙利社會主義人民黨（即俗稱匈共；現更名爲匈牙利社會黨）的改革來自基層年輕黨員的壓力很大，「十四」大的一二七六名代表中約有八三%是初次參加全會，^③如今位居要津且負有改革重任的領導成員年歲都很輕。反觀東德社統黨政治局的新陳代謝，主要來自民衆的壓力，對許多還在權力階層的黨政官僚眼中，大幅度的改革就是未來體制變更的前兆。

共黨政權的改革一般都有其局限性，歷經改革艱難過程的東德，想必也不會例外，這也是爲什麼政治觀察家會對匈牙利最近的突變，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我們不必從克倫茲過去的黨政經歷，去論斷其是否具有改革的誠意；也無須從蘇聯或匈牙利改革模式發展取向，來預估社統黨會進行到何種程度的改革；祇須從克倫茲上臺後社統黨一連串的開放動作及人事變動，

註① Joachim Nawrocki, "Für Glasnost zu wenig", in *Die Zeit*, No. 38/1989, p. 25.

註② *Ibid.*

註③ *Der Spiegel*, No. 42/1989, pp. 198-200.

即可論定社統黨想持續掌握政權，除了從事政治經濟改革外，似無其他更好的辦法。以目前東德內部情勢變化的速度來看，少有人願明確地預估其未來改革的極限；然而能以肯定的是，東德共黨踏出改革的步伐愈大，再走回頭路的可能性即愈小，客觀環境所受到的限制也愈多；換言之，除非東德共黨敢冒險政權垮臺之險，援用中共「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武力鎮壓手段，否則民衆的改革呼聲與要求就不會終止。^{②4}

從這一次東德內閣全面改組，徵召德雷斯敦地方書記莫德洛繼任總理來看，顯然東德共黨爲了恢復人民信心已經亮出最後的一張王牌。長久以來在基層即擁有雄厚民意基礎，時時被東德民衆稱爲「希望寄託者」與「未來改革者」的莫德洛，自一九七三年被撤除中委會宣傳部部長職務，下放至地方以來，就因爲他的領導作風與元老派相互矛盾，因此在許多共黨中央領導人的眼中，無異是一名違背黨路線的叛逆。這位多次受到東德主教、西方媒體，甚至於戈巴契夫本人一再稱讚的六十一歲共黨中央委員，平日生活極爲簡樸，和善的待人方式與耐心聽人細訴的雅量，比起其他那些非西方進口貨不用的黨政官僚，莫德洛的親和力自然會受到東德人民的期許。十一月中旬，莫德洛率先邀請德雷斯敦當地民衆，面對面地溝通，希望帶動共黨中央與民衆的對話意願。^{②5}

與莫德洛同具聲名的東柏林書記沙布斯基（Gunter Schabowski）在克倫茲提携進入權力核心後，社統黨政治局基本上已形成一個鐵三角陣容，未來的社統黨很可能會以此爲架構，從中央至地方作更大幅度的人事改組。東德敢冒險開放柏林圍牆，與前述三人的結合也有密切關係。

肆、未來發展取向

由難民潮開始迄今東德情勢的演變足以發人深省，共黨政權想要紓緩內部的社會與經濟危機，僅靠聲望乎衆的某一個領導人，絕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根本，唯有朝野達成全面革新的共識，逐步朝改革的路程邁進，人民外流的現象始可終止。當前已有跡象顯示，西德提出經援東德的三項先決條件：邊界透明化、中小企業私有化、言論與結社自由化，^{②6}部份已能獲東德新領導階層的接受，特別是開放人民出國自由旅行。克倫茲新領導層口中的社會「安定與秩序」，必然要建立在設法恢復人民信心的基礎上，因此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很可能會隨著人事不斷地調整而進行；例如准予工會自治、保障人民言論自由、重新舉行地方選舉、嚴禁媒體由上層控制、或開放各黨公平競爭等。毋庸置疑，上述這些改革措施如果都能徹底作到，很可

註②4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日來訪的西德內政部發言人郝斯曼（Willi Hausmann）與筆者有相同的看法。

註②5 *Der Spiegel*, No. 40/1989, p. 27.

註②6 *Der Spiegel*, No. 41/1989, p. 23.

能會走向「匈波模式」中修憲的路子，廢棄憲法第一條「國家必須由馬列意識政黨治理」的規定。當然，東德的修憲尚待時間的考驗，但是作更大幅度的開放，則無時間的限制。

至於東德經濟困境的改善，特別是經濟生態結構的改變，必然會經歷一段漫長的過程。當前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挽救因為中央集權式計畫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生產力萎縮情形。准許企業自負盈虧、市場決定價格、與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等三項原則，是西德提出改善困境的先決條件，同時也是決定能否以聯合企業 (Joint-ventures) 的型態，去幫助東德提昇工業管理水平與改造工會組織結構的因素。^⑳私有財產制的建立尚非現階段最迫切的問題，如何先讓企業界獨立自主，提高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以形成市場經濟的雛形，才是改革過程的成敗關鍵。

許多東德的黨政領導人潛意識中都有排斥西德財政施捨 (charity) 的心理，一般東德民衆也不希望西德施予額外的經援，^㉑起碼也要在社統黨領導向人民交待以往如何運用每年自西德獲取的數十億馬克的外匯後，才能論斷社統黨是否真有誠意進行改革。

伍、結 論

東德最近內政上的轉變，絕非意味著資本主義世界的勝利，祇能說是民主自由的意念戰勝了專制獨裁。從整個歐洲歷史的演變過程來看，東德日後的改革應不至於全盤失敗，更不會因此導致東德國家體制的崩潰。嚴格說來，東德的改革過程與戈巴契夫個人的成敗緊密相連。維持一個安定的局面，對東西方都有益處。戰後迄今，東西方關係的演變從未像一九八七年年終美蘇簽定「中程核武裁減條約」以來，有如此大的轉機。面臨即將到來的一九九〇年代，東西方兩大集團很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裁減限武措施，屆時歐洲的情勢是否會因為東德的變化，而帶動捷克、保加利亞、或南斯拉夫等其他東歐國家步向改革之路，進一步使北約與華約兩大軍事集團名存實亡，共同朝向實現戈巴契夫「歐洲共同家園」的理念而努力，端視歐洲現狀能維持多久與東西方國家軍事以外的合作層面能擴展至何種地步。一九九〇年代歐洲和平的觀念，已不能祇建立在維持強大軍事力量的基礎上，東德改革的過程，需要一個穩定的中歐情勢，其成敗直接影響到兩個德國的未來關係取向。如東德德的改革過程順利而圓滿，非但能激發捷克、保加利亞或羅馬尼亞等鄰邦領導人的改革意願，對整個德國的統一，也能奠定紮實的基礎，甚而作為未來歐洲區域整合的模式。^㉒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完稿)

註⑳ Helmut Schmidt, "Ein Aufstand gegen Zwang und Lüge," in *Die Zeit*, No. 46/1989, p. 1.

註㉑ *Ibid.*

註㉒ Gianni De Michelis, "Ein Ansatz für Mitteleuropa," in *Die Zeit*, No. 46/1989, p. 10.